

（第四十輯）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邱云松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7.5 插页1 字数 165 千

1992年4月第1版次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583-6/K·212 印数1—3,000

定价：3.50元

目 录

杨伯恺与辛垦书店·····	沙汀 (1)
回忆《华西日报》·····	赵星洲 (15)
成都《社会日报》概述·····	左东枢 (30)
资中高培谷兴学始末·····	王志行 (37)
从三台草堂国专到成都尊经国专·····	袁海余 (42)
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	宋大鲁 程世平 (51)
解放前四川艺术教育概述·····	周 稷 (64)
回忆谐剧的产生·····	王永梭 (69)
川剧资阳河流域与张德成·····	萧士雄 (76)
熊克武生平述要·····	李际权 黄爵高 傅渊希 金振声 (82)
但懋辛事略·····	傅渊希 但功澄 (103)
重庆名妓姬三姐·····	蒋洽清口述 载民笔录 (108)
重庆“九二”火灾真相·····	孙曙 杨懋 杜俊龙 杨耀健 (126)
重庆开埠至抗战前四川棉纺织业盛衰概况 (1891—1936)	
·····	刘昌仁 (137)
裕华纺织公司的建立及其在四川的发展	
·····	陈昌智 (155)
1945—1949年四川经济记事 (下)	
·····	刘方便辑录 李运元 钟振巾校 (187)
更正二则·····	(214)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至第四十辑分类目录	
·····	(215)

杨伯恺与辛垦书店

沙 汀

1929年夏，我于白色恐怖中去上海，在西艾咸斯路看望萧崇素时，与住在他家对门的葛人高（即葛乔）也碰头了，我俩都在成都省一师读过书。他低我两班，在校时没有多少交往，只是互相知道彼此的政治面貌。

同葛乔碰头后，陆续认识了南充人任白戈、王义林，他们也是在“二·一六惨案”后分头到上海的。这两个都是吴玉章任校长、杨伯恺（原名杨道康）直接主持教务的中法学校的学生。伯恺和白戈当时都在招商公学教书。伯恺在“三·卅一惨案”后就离开四川了。

后来我由萧宗英介绍从旅馆里搬到荣桂路东横滨路口法界姚神父路新天祥里，同行的还有谢兆华、刘还昌、蒋士洵，等他们分别去报考学校后，我又单独搬往德恩里住下来，葛同王也搬到附近的景云里。白戈“三·卅一惨案”后曾在成都同周尚明一道工作过一段时间，而周又是我参加党的介绍人，且在“二·一六惨案”中牺牲了，所以不只是了解我的为人，且有一种特殊感情。他第一次到新天祥里来看我，我们就一见如故，谈了一个上午。其时，同行的都分散了。后来，他在星期日到东横滨路景云里看葛同王，总一定要到德恩里看望我。

有关成立辛垦书店的计划，是1929年秋天谈起的。随后，我也搬到景云里和葛与王同住，跟他们一道学习日文。大家组织出版社的意图，主要在于便于出版自己的翻译著作，宣传革命理论，不是想做出版商人。计划基本决定后，我就同他们一道去见杨伯恺同志。因为他既是任、王的老师，又是四川的革命前辈，最后得由他拍板。

由葛说明我们商议过的具体情况后，他立刻同意了，还约了也在招商局公学教书的共产党员陈子中参加，并一再鼓励大家抓好日文学习，对革命理论认真进行研究。以后，他又到东横滨路来过两次，进一步商量成立出版社的问题，主要是资金和第一批出版的书籍目录。当时我的经济情况最好，首先就拿出500元，并承允将陆续凑足1000元。此外，还可能向家乡亲友募集几千股款，因而大家要我作董事长。杨和任各自出200元，陈子中出300元，葛和王都没有现金入股。

葛相当了解当年一般同人出版社的组织、经营管理情况，办事能力也相当强，大家就推举他作经理。书店的名称也是他提出来的。“辛垦”二字是英文“思想”一词的音译。从中文讲，则是辛勤垦植的意思。出版社没有明确规定宗旨、方针，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宣传马列主义，这在第一批书目中也表现得相当明确：杨准备翻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和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来由刘初鸣翻译）。任决定翻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翻译苏联伏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我和王也参加这本书的翻译。

为了筹集更多股金，也为了自己能有较大收入，以便入股，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翻译、著作，杨于1929年冬天在成都大学谋得一个教书职务。因为成大校长张表方是他青年时代在南充读中学

时的老师，南充又是过去的顺庆府，杨的家乡营山则直接属顺庆。当然他本人的资历、学识也很有资格进入四川当时的最高学府讲课。还有宁、汉合流一两年了，四川的政治气氛已经平静下来。

杨回川不久，1930年初开始出书，第一批预定的书目大体都陆续出版，还有一两本文艺书籍，一是美国左翼作家的《果尔德小说集》，一是日本左翼作家青野季吉的文学论文集。

1929年叛徒任卓宣到上海企图找党中央解决组织问题。他与杨伯恺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相识的，又是顺庆府的同乡，他也找杨伯恺说明过意图。当他知道我们在筹办书店时，便通过杨伯恺要求加入。

在此之前，任卓宣曾在成大作张表方的秘书，并得张表方帮助出了一本名叫《科学思想》的刊物，常用青锋的化名发表文章，有时也根据张表方的指示、意图代张草拟文章，在进步知识界取得相当好的反应。

我当时并不知道青锋是任卓宣的化名，对他曾在长沙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罪行也知之甚少，经任白戈、葛、王等反对，这才知道他的反叛行为，当然也和他们一致表示反对。杨解释说，青锋来上海一事，他曾向四川省委请示过，四川省委批准了这一请求，让他到上海搞翻译、写作。60年代初我在上海治病，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曾在巴金同志家里向我证实过这件事。因为当时他也在成都工作，只是他认为当时省委不该点头同意，因为后来任卓宣又一次叛变了。

我们几位书店发起人同意杨伯恺提出的让他为书店翻译书，但不作为股东的要求。此外我们还提出一些条件，杨也表示可以向青锋提出来，并估计他会承认这些条件：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

不出头露面，只是从事翻译介绍革命书籍。这件事情算相当圆满地解决了。

青锋到上海后，曾到东横滨路与宝山路邻近的一座楼房里，同几位书店发起人长谈过一次，详述大革命时期他在长沙自首变节，出卖同志的具体经过，尽力为自己开脱罪行，说他第一次被捕后，曾被枪决，未死，经人民救治伤愈后又一次被捕，这才自首。他把责任归之于组织，说不该于他伤愈后，用他所隐蔽的住所作通讯联络地址。最后坚决表示，他来上海只想埋头翻译、著述，从事理论介绍工作，绝对不参加政治、社会活动。

叶青是任卓宣到上海后的又一化名，他不再用“青锋”这个化名，同时真也做到深居简出。这都是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他的底细，算是实现了对我们的诺言。此人似乎有些迂气，学究气味很重，所以我们互相间提到他，都叫他“老夫子”。除了向书店交出的第一本书稿蒲列汉诺夫著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外，其余皆为有关历史哲学的专著。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写的。从这方面看来，他并不迂。他专心出版自己的著作，不是翻译马列的作品。这跟他提出的诺言有些不符。因为原先说好，主要是译介马列的作品。书稿看来问题不大，最迫切的需要是增加资金，于是我于1930年夏回四川，募集自己承认过的股金。最低限度，我得设法凑足已经承诺的1000元。我相信我舅父郑慕周是会支持我的，他热心文教事业，我曾为他在安县筹办过一所小学和一所图书馆。

回转家乡之前，路经成都，我会见了杨伯恺同志，他告诉了我一些募股情况。看来并不怎么理想，只有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集的一笔款目不超过500元的股款算落实了，但他寄希望于陈静珊。陈，还有张志和、吴景伯，当时在四川军官中是以亲共

闻名的。我记得“三·卅一惨案”后他们中还有人公开表示过反对刘湘、王陵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屠杀。是谁介绍他认识陈静珊的，我记不起了，但这一点很确切：他曾领我一道去看过陈。陈的防区是广汉、新都一带，其时恰好回到成都，住在自己寓所里。我依稀记得地址在今省广播电台附近，可能他的寓所就是广播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是以书店董事长身份同杨一道去看望陈的，并向他直接说明，我是来募集股金的。我向陈介绍了准备出版和已经出版的书籍目录。在谈到我预想中的主要募集对象——我舅父郑慕周时，陈当时搭腔说了这样的话：“他能入多少股哇？”因为他知道郑是下野军人，官阶不高，又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不大相信他肯资助宣传革命理论的出版事业。

陈静珊接着表示，他一定全力支持我们，要我们搞个具体的书面计划给他，看看需多少资金才能实现我们的出版计划，他将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听他的口气，大有倾囊相助的气概。可以说，这次会见，对于辛垦书店此后的发展、变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把搞书面计划的事全部推在伯恺同志身上，自己便回家乡去了。由于我的婚姻问题，我舅父和其他故旧，都不愿支持我，后来还是向仁寿夏正寅募了两三百元股金。我自己的1000元算勉强凑齐了。

回上海路经成都时，我又同伯恺见过两三次面。其时，他早把他承担草拟的书面计划交付陈静珊。可我没有再见过陈，只是通过杨同何伯庄、皮仲和见过面。皮是成都大学学生，也出了几百元股金，本来约好同杨一道走的。因为他回营山、我去上海都得经过遂宁，彼此可以同一段路，遂结伴而行，然后在遂宁分手。因我爱人黄玉颀已经放寒假，在成都无合适的地方居住，就早两天动身，以便能搭上长途汽车前去合川。30年代初，在四川

搭长途汽车很难，直到伯恺经过遂宁，我还在遂宁等车。

跟他一道的还有个跛子，姓王，也曾在法国半工半读。南充人，是成大的教职员。他们也住在那个比较新式的旅馆里。次晨一早，他们就继续赶路了。当天夜里，伯恺单独向我谈了谈王的经历。王在大革命失败后搞武装起义，跌断了一条腿，幸而逃脱了反动派的追捕。我记得在谈到这一点时，伯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你十多条枪，百多个临时召集起来的群众，搞什么武装起义嘛！”神情颇为惋惜。这次谈话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它使我想起两年前绵竹的一次武装起义。

回到上海后，我先在法租界菜市路住了一阵，随即又搬到东横滨路德恩里。因为书店就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我去书店比较方便。当时书店只有一位姓廖的营山青年作葛乔的助手，有时忙不过来，我得去做些具体工作，例如包装书籍、到邮局寄书等。我记得，车耀先同志办的“我们的书店”，还有合川一家小书店，就经常代销辛垦书店的书籍。我返回上海不久，伯恺曾两次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每次1000元。

大约在1930年秋，伯恺回到上海。他告诉大家，陈将陆续汇寄股金，只要书店需要，他都可以尽量满足。这当然叫大家感觉“辛垦”在出版事业上大有可为。但是，他提出的计划中有一些也使大家（主要是我、白戈、葛乔和王）同他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分歧：从四川搞一批革命青年来，让他们钻研革命理论，学习外文，书店按月供给一定生活费用，将来在他们写出译出著作后，从应得的版税、稿费中扣除。我们反对，一怕书店拿不出钱来，二怕来的人写不出书，三怕坏人混入。可是伯恺却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做法，钱完全不成问题。他说得非常肯定，而且已经带了成大同学刘元圃和谭辅之一道来上海，作为培养对象。谭是南充

人，刘仿佛原籍营山。从伯恺的谈话可以看出，陈静珊对他十分信任，曾经约他到广汉防区作客，并请他为当地修建的一座带有革命意义的纪念碑写过一篇序文。在我和任白戈同志1932年底退出辛垦书店前后，从四川还来过三五名中青年，其中只记得有一位叫王宜昌，是民力大学的，不久就离开了。此外，还有老一辈诗人邓均吾，是来搞翻译的。但我同他们都无来往，只有邓脱离书店后与我会见过一次。他认为，他早就不该参加辛垦书店。

除上述分歧外，还有一两个问题，分歧也大。创办所谓理论刊物《二十世纪》，就争论过一阵子。我同白戈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担心稿源和稿件的质量。当然也担心销路，怕赔钱。这件事显然是叶青策划的，而且取得陈静珊的支持。因为叶青曾于伯恺同志回上海后去过成都，所以他们异口同声说陈静珊同意拨笔专款来办刊物。至于稿源问题，在我听来他们更振振有词。因为我既未写过理论文章，又无翻译能力，最后只好让步，而且同意作刊物的发行人。任、葛、王也勉强同意了。对于接受与陈独秀在路线上一致的刘伯庄在书店出书一事的分歧，解决得比较迅速。因为他们同意指定他翻译马、恩、列的著作。可是后来，刘伯庄却用刘敏的笔名写了本《论物质》。

刘伯庄是南充人，曾经在法国半工半读。回国后在北京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于1928年夏在奉系军阀的屠刀下逃生，流亡到上海，变成了“取消派”。当时自己的政治水平低下，学生时期对李大钊、陈独秀又相当推崇，所以虽然知道“取消派”是个分裂党的派别组织，经过争议，后来也同意刘在辛垦出书，并同意可以同谭辅之、刘元圃一样，每月借支版税。当刘伯庄拿出所作《论物质》让书店出版时，叶青解释说，他法文生疏了，虽译过由书店指定的书，但是错误百出。当时未加反对，因为认为反

正是理论著作。叶青又一直以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相标榜。现在想来虽觉可笑，但我当时似乎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纯之又纯的革命理论。伯恺同志说，他对这一点也坚持得很认真，没有让任曙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在辛垦书店出版。后来倒是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这本书。

任曙原名任昭明，南充人，也是个取消派，大革命时期在党内担任过一定负责工作，年纪比叶青小一些。他经常到书店夸夸其谈，尤其喜欢谈党内一些负责同志的私生活（如两性问题等），乃至涉及到陈独秀。当然也吹嘘他那本书的主要论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呈现发展趋势，农民生活也有改善。其结论不言自明：农民没有革命的要求，这就无疑否定了党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成立苏区的前提。他还引证不少“资料”来证明他的论断的正确性。

任曙同叶青是否有来往，不得而知。因为叶青的住处相当秘密，他本人又很少到书店，有什么事总是由周绍章出面。我也很少去叶青的住处，他的生活情况，一般都是从周绍章口里知道的。他几乎成天都在家里为《二十世纪》写稿、看稿，生活相当简单，多弄一样菜都嫌麻烦，主张饭和菜一锅熬，连吃肉都这样。他自己不动手，周除了帮他做饭、跑街打杂外，还要为他抄写稿件。他总担心为吃饭把时间耽误多了。周经常把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当作笑话来讲，仿佛叶青有点古怪。当然也不无佩服的意味，而我却只感觉有些可笑。

伯恺同志的生活很简朴，但却并不叫人感觉可笑。“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白戈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使我和我妻子黄玉颀、艾芜从日军控制下的东横滨路撤出，绕过两道岗哨，穿过几条小巷，领出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安顿在法租界吕班路一间楼

房里。我们同伯恺以及刘元圃等同住过一段时间，一道吃由他安排的大锅饭，印象相当深刻。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在省师读书时有过体会。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每逢假期，我本可以回家过得舒适一些，但在同班同学张君培影响下，我却甘愿留校，同这位思想进步、无家可归的级友一道生活。有时只买几个锅魁就解决一顿伙食。而在淞沪战争结束后，我却婉言谢绝了伯恺同志要我同他住在同一幢楼房里、以便就近商量有关书店的问题的建议。而实际上他是想帮助我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及认真学习日文。他辞去成都大学的教职、重返上海以后，曾不只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两三个书店的青年发起人说：“要拿出东西来啊！”个别喜欢社会活动的书店发起人，一提起他总要批评两句，因为他一直希望我们多出点书。可是，白戈、葛乔和王义林在各自翻译了一本书后，就没有再从事翻译了，也没有写作理论文章。我呢，根本就没有出版过什么书。作为一位前辈，他自然感到惋惜。

其实，在淞沪战争爆发以前，我同艾芜一道在东横滨路德恩里居住时，就决心搞创作了，在向鲁迅先生请教后，更加坚定下来。因此，战争刚结束，我就前去杭州，住在岳坟附近的“汪社”进行写作。1932年回转上海时，我就编成一部习作，准备交辛垦书店出版。当时我住在虹口菜场附近一个小弄堂里，伯恺同志也住在那一带。我住到那一带去，主要也为了便于常去看他。但在出版我第一本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问题上，却弄得彼此都不愉快。这种不愉快主要在于我有些急躁，对伯恺同志未能爽爽快表态，便立即产生了反感。而他又一直强调出版理论性书籍的重大意义，在我们出版《果尔德小说集》后，他还表示过异议。因此，我把他的特重误认为他不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乃至拂袖而去。这弄得伯恺同志莫名其妙，也有些生气。幸

而白戈从中劝说，当伯恺派刘元圃到我家里取稿件时，我将11篇小说全部让他带走。稿子也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他通知我，已经送交印刷厂了，并让我看了将要刊发于《二十世纪》的《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广告。

这一来，我们应该相安无事了吧。然而，就在这年年底，我和白戈都退出了辛垦书店。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日益严重，唆使特务捣毁进步书店。辛垦书店的书刊，特别是《二十世纪》发刊后，曾经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我记得，邓初民同志还到过书店，抱怨买不到《二十世纪》，希望能在他们学院附近的小书店出售。甚至颇有名气的大学教授李石岑还四处探听叶青的住处，希望能同他见面，讨论一些哲学问题。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伯恺同志不必说了，便连我也感到又喜又忧。叶青的反应如何，则可想而知。伯恺同志好几次向我和白戈大发感慨，对反动派发泄愤懑之余，深感自己为革命奋斗多年，经历过不少艰险，现在好不容易兴办起一桩事业，而且在客观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可又面临危险境地，终日忧惧书店遭到反动派摧残。有一次，他向我们提出，叶青在大革命时期的熟人在南京工作的不少，是否叫他去拉点关系，为书店减少一些风险。我和白戈表示，禁书、查封书店固然可虑，但决不能叫叶青向南京拉关系。伯恺同志也就没有再提此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负责书店经常管理工作的张慕韩，喜不自禁地悄悄告诉白戈，说辛垦不会遭查封了，因为叶青已经去南京找过周佛海了。张慕韩也是南充人，同叶青留法前就长期友好，是伯恺同志回上海不久，总揽一切事务以后，由叶青推荐的。此人外表朴实老好，长期在南充中学和小学作教师。他同叶青的关系，在辛垦书店的成

员中，可以说是最密切的了。他还告诉白戈，当时《社会新闻》的主编、文化特务朱新亿找过叶青。

白戈很快就把张慕韩讲的情况告诉我了。我们都很不满。经过商讨，我们决定退出辛垦书店。这时候，艾芜已经加入“左联”，他在杨树浦办工人夜校、发展工人通讯员时被捕。我同“左联”党团员负责人原本认识，由此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因为这位负责人不只告诉我艾芜被捕的消息，还送来鲁迅先生捐助的50元作聘请律师的费用。我就顺便向他反映了叶青同南京的关系，并表示白戈同我决定退出辛垦书店。我得到了他的支持、鼓励，这对我们退出书店起了相应的作用。

在我们正式向伯恺同志提出退出书店时，他有些惊怪，而且从我们的措词中猜到了我们对叶青去南京拉关系感到不满。他一再表示挽留，因为早在1930年秋他返回上海不久，葛、王就相继脱离了书店，如果我们再退出去，5个发起人就只剩下他一人了。而且我还负担着董事长的名义。所以最后他约我前去叶青的住处一道谈谈书店问题。白戈是他的学生，态度比较缓和。我记得，在约定的时间，白戈没有同去。这时叶青已单独住一栋弄堂楼房了，而且他的兄弟、妹妹也早从南充来了，帮他料理生活。十分明显，他已能在书店按时拿到相当丰厚的稿费、版税。

这个家伙当天真是口若悬河，一坐定，他就同我大谈书店的发展前途，而且谈得具体、细致，似乎就连北新书店那样的规模、排场，都不在他话下。尽管当时辛垦的新店址较之北四川路四川里的房舍宽敞一些，却还没有门市部。而在吹嘘一通书店的远景之后，他就回答我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是否去过南京？他无疑早就有准备了，一来就肯定他去过。但是却诡辩说，他去南京，因为有人介绍了一位中央大学的女生同他交往，他得去南京

亲自面谈一次。他表示自己对这位女生相当满意，他们已开始通信了。因为对方是学历史和哲学的，他们的通信，主要也是谈这两方面的问题。并且将来准备出一本书信集，就用所得稿费、版税来作结婚时的开销。这家伙越来越得意忘形，我可再忍不住了，嚷叫道：“你真会打算盘！”接着就离开座位，匆匆下楼去了。在楼下，他的兄弟看了我的神情，惊怪地嘀咕了一句：“咋就走啦？”叶青的吹嘘掩盖，原在劝阻我散伙，结果却反而使白戈和我很快就退出辛垦，就连家也搬了。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对伯恺同志那样强调革命理论的研究和传播，那样维护书店的安全，乃至同意叶青去南京同周佛海拉关系，是不够理解。他一直是搞宣传教育工作的。北伐前后，我们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和被蒋、汪相继出卖以后经历的挫折，他都深有体会。“三·卅一惨案”后，他死里逃生，前去武汉；不料宁汉合流反共时，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却规规矩矩向反动派交出武器。他到上海后，“左”倾机会主义又抬头了，飞行集会他亲眼见到过，王跛子那类事更时有所闻。

上述两类情况，他都向我谈过，可是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些挫折正是促使他苦心经营和维护辛垦书店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可以由此探索到他的思想根源。当然，不能说他所采取的措施无疵可寻，但是，在重大问题上，我觉得除他同意叶青去南京拉关系一事而外，我从未听到过他有反对党在江西创建武装根据地的言论。他断然拒绝出版任曙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就是明证。同时我那本习作《法律外的航线》中，却有两三篇试图宣传当年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尽管它们都远不是成功之作。

在退出辛垦书店、搬离虹口菜场一带以后，我就同伯恺同志没有什么往来了。白戈呢，因为他们有师生之谊，又在招商公学

共过事，偶尔也到书店去坐坐，从而得知他和叶青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而由于陈静珊对他的信赖，书店则基本控制在伯恺同志手里。辛垦停止前一共出了三套理论丛书，有一套叫唯物论丛书，是出版17—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第得诺、拉梅特利、霍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宣传唯物主义的。我一本也未读过。我认为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应该对它们进行研究、评价一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主要作用何在？就是《二十世纪》吧，尽管叛徒叶青是主编，又发表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有几十万字的《胡适批判》和《张东荪批判》，究竟有无一点进步意义？“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党所发动、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伯恺同志的政治面貌，终于越来越鲜明了。在他主持协进中学时期，曾经介绍了不少同学前去延安。尔后又主持《华西日报》笔政、成都市民主同盟的会务。据我所知，邓锡侯、刘文辉在解放战争后期的起义，他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对陈静珊的影响更加不必说了。特别是在反动派土崩瓦解前夕，为了维护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的利益，他能临危不惧，同群众一起挺立在逆流面前，以致牺牲于成都的十二桥。

单说他临危不惧，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革命风格和革命品质，这里还得转述一下解放后我从李筱亭李老那里听来的生动细节。在那些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乱捕乱杀的日子里，曾经有人劝他，不妨暂时离开成都以避其锋。他断然拒绝了，说：“这个时候能把工作搁下来吗？”随后又有友好向他建议：“这样好吧，你晚上换个地方睡觉，不要住在家里！”他听罢大笑：“这一来不更动摇人心啦？！还会闹成笑话！”仍然没有采纳，乃至于被捕后托人保释都不同意……。

退出辛垦书店以后，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又开始同伯恺同志